

藏外佛教文獻

樸初題



方廣錫

主編

第三輯

宗教文化出版社



藏外佛教文獻

第三輯

主編 方廣鋐

宗教文化出版社

(京)新登字 317 號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藏外佛教文獻 第三輯/方廣錫主編. —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7.3

ISBN 7-80123-092-2

I. 藏… II. 方… III. 佛教—文獻 IV. B9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97)第 03053 號

2620/17
藏外佛教文獻(第三輯) 主編:方廣錫

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市崇文區沙子口路 72 號)

全國新華書店經銷 北京市通縣振興印刷廠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開本 15 印張 305 千字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0001—3000

責任編輯:史 平

封面設計:張九林

ISBN 7-80123-092-2/K·35

定價:30 圓

佛前忽然不現今時文殊師利菩薩前白佛
言如來今有何緣意告波旬言我於此法

不作加護佛言文殊師利以無加護加護此
法是故爲彼說如是言以一切法平等實際
皆歸真如同於法界離諸言談不二相故無

有加護以我如是誠實之言無有虛妄能令
此經於閻浮提廣行流布今時世尊說是語
已告阿難言此經名爲普入不思議法門若

能受持如是經典則爲受持八萬四千法門
等無差別何以故我於此經善通達已方能
爲彼諸衆生華演說八萬四千法門是故阿
難汝於此法當善護持讀誦流通無令忘失
佛說是經已文殊師利菩薩無垢藏菩薩等
者阿難及諸世間天人阿脩羅乾闥婆等聞

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大寶積經卷第二十九

火九十二末

覺禱

捷疾

跏趺

最初勅賜弘教大師離藏經院記

鄧州長子陳權進之女名法珍自幼好道年十三歲辭家
嘗後捨舊願離造藏經垂三十年方克有成大定十有八年
始印經二藏進於朝奉勅旨令左右街十大寺僧會花迎經
於大聖安寺安置經而宣法珍具行宮中尼寺賜號法珍
奉旨印藏經已蒙勅賜其置名創所造經院額上進
度得頒布聖教仰報國恩奉詔許之聖命聖安寺爲法珍
直壇慈覺受母爲比丘尼仍賜錢千萬兩內開賜五百兩
起經經板三十二年進到寶師其所進經板九十六萬八千二
百三十三計陸十九百六十萬卷上命有司運通經板開導
遵年五十八歲至二十三年賜法珍紫衣號弘教大師其母
遵年亦賜紫衣德諱其同心協力離經板佛恩垂七十二年
奉勅賜檀弘教大師爲師仍置經板行天皇寺運通經

建禮落髮受具為比丘足仍賜錢千萬泊內開賜五百萬
起運經板至二十二年進到京師其西進經板凡十六萬八千一
百一十三計陸千九百八十為卷上命有司選通經沙門導
遵寺主入板至二十三年賜法珍紫衣誦出教大師其事
遵寺亦賜紫衣總攝其同心協力雕經板楊惠等七十二人
並感牌許禮弘教大師為師仍置經板於大昊天寺並流通焉
顯載奉遷之際古未有也自昔釋迦如來為一大事因緣出
現於世靈山演法各隨衆生根器利鈍方便分別大小乘教
為世津梁後人因之誠心達本悟無為法者莫可以數計矣然
教法之興雖係於人亦由其時自漢明帝歷晉魏以來雖有
釋氏經典所傳由未廣也其後玄奘義淨二大才跋涉航海
至天竺國不憚艱苦磨以歲月得經教焉自是震度旦佛法
備矣是以城邑山林精藍塔廟或建寶藏或為轉輪安置
經書為世福田蓋繼若素書寫受持頂戴奉行者無復無之
蓋如來本願欲使衆生見聞而獲福也然今弘教大師傳作
苦行以列鐘版板為本願於是協力助緣劉法喜等至餘人
亦皆出鼎鑪煙煤指割眼到所至有捨家產鬻男女者助修
經板勝事始終三十年之久方得成就嗚呼可謂難哉已
門人慧仁特具言刊經本末謂文於東牟趙風述評成
以己丑狀諸寺板嚴觀書板為是本寺版與缺少事在修少
妙嚴三刺印補見提經板多有朽爛欠缺設心備板募眾
緣命三刊補幸獲完備今喜頓自思刊補小缺經於歲月
至難成就想當時弘教大師自初出家辦置經板刊刻微板
始於三千年方得成就實為世間第一希有功德而復應
金世宗皇帝勅賜錢及字記嘉善哉得非有是道復有是人是
人復遇是時以成難成之功庶不負知來付囑之意嗚呼
前招之功於斯盛矣繼夫久而成其所由無傳於世因而刊之使
後賢觀其師由遠不昧弘教大師之功也耶
皇宋徽宗宣和元年冬望月杭州仙林萬壽增修殿春題題

菩薩衆及彼一切計天子衆及尊者舍利弗
尊者摩訶迦葉諸比丘衆乃至所有天人阿
脩羅諸龍鬼神一切衆等聞佛所說皆大歡
喜信受奉行

文五 十七末

大寶積經卷第一百五

杭州府紀王虎阜上同	平龍岡式來清	韓龍虎已智清
外霞陸氏妙喜	姑虎氏敏清	鄭虎氏福清
報應觀音月現慈光公	祖崇人金氏	然公事虎公
叔公林事虎公	叔家鶴劉氏	有長事虎公

外住者同春會同門中受戒宗親同生序立書經其者

來佛信人死安同 敬班譯 韓陸氏福寧 弟沈宇

最初離遠大廣經板

昔吳州刺史王康進之女法珍年二十三歲時出使發大寶願

離廣經板每三千年方刻有成大之十有八年始印成進於

朝勅旨迎經於大聖安寺達壇受具爲比丘尼仍賜錢十

萬酒肉兩施錢伍佰萬起運經板至二十年至京師其所運

經板九一十六萬八千一百一十三面爲藝共千九百八十勅諭有

司運通經外門運運等五人教近二十三年陽法於法未始編

私教大師其備力離遠經板楊惠運七十二人並給戒牒許凡

翻經者皆爲五所看當其事者皆爲五所住者皆爲

私教大師爲師置經板於大吳天寺奉奉運通焉然其已

經本多謬誤故教定其爲難令私教大師修修善行以列經版

經爲本賴於劉法者等五十餘人亦皆勤勞竭誠備極艱辛

肝至有捨家產繼男妾者照經板應事始終三十年之久

方得成就嗚呼可謂難也哉爾宋興七年己丑歲杭州仙林講寺

依教奉願爲見本年歲成數多缺欠當往續以妙藏二利開闢

因見般寺經板多有朽爛缺少發忿德後化募衆緣命云利補

先修經於歲月率難成就今幸辰自思往昔私教大師自始以清

淨堅固勇後之心斷斷改善刊刻廣經板數二十方始終三餘年

方得成就實爲世間第一希有功德此其所以成難成之功也

因而刊之使後觀其所由不昧初因者也

宋興九年歲次辛卯仲秋吉杭州仙林講寺板殿 善敬 謹題

卷首語

方廣鋁

光陰迅忽，從 1994 年夏醞釀編輯《藏外佛教文獻》算起，至今已兩年有餘，而《藏外佛教文獻》的第三輯也終於送到讀者諸君面前。從第一輯出版以來，我們收到海內外不少讀者的來信。有的對我們的工作表示熱情的支持；有的向我們提供新的未入藏佛教文獻的信息；有的對我們的整理本提出補正意見；也有的寄來資助款項，希望我們能夠把這件有意義的事情堅持做下去。在此，謹代表編委會全體成員，向關心本書成長的諸位讀者表示衷心的感謝；向對本書出版給予大力支持的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香港志蓮淨苑、山西省佛教文化事業總公司及其他有關單位與個人表示衷心的感謝。我們相信，在大家的支持與幫助下，《藏外佛教文獻》一定能夠堅持出版下去，直至完成它的歷史使命。

在此，先把《藏外佛教文獻》第三輯刊登的文獻作一個簡單的介紹。

“敦煌禪籍”專欄刊登敦煌禪文獻兩篇。

《菩薩總持法》由禪宗南宗慧能系傳人所撰，內容與託名菩提達摩所撰的《觀心論》有類似之處，兩者的關係有待研究。這一文獻最早由日本田中良昭先生在法國敦煌特藏中發現，發表過錄文與研究。這次則由日本著名佛教學者上山大峻先生與我國敦煌研究院年輕研究人員

袁德領先生參照在北京圖書館新發現的該文獻的另一個抄本,按照《藏外佛教文獻》的體例要求重新作了整理。這樣,就給研究者提供了一個新的整理本。敦煌學已經是一門世界性的學問;佛教文獻的整理本來就是一项需要不斷精益求精的工作。因此,我們歡迎世界各國的有關學者都來從事敦煌遺書中佛教文獻的整理,歡迎有關學者對已經整理過的文獻作進一步的精益求精的努力,共同把這項人類的文化事業做好。我們也熱烈歡迎所有從事這一工作的先生在《藏外佛教文獻》上發表他們在這一方面研究成果。

《大乘起世論》也是禪宗南宗慧能系傳人的作品。從思想上看,這篇文獻所反映的南宗思想更為純熟;從風格上看,這篇文獻已經出現類似棒喝的機鋒。考慮到該文獻抄寫於敦煌被吐蕃統治時期,因此,它的產生年代大約在公元八世紀上半葉。了解《五燈會元》這類後代禪宗典籍的讀者在閱讀本文獻時一定會感到十分面熟,這說明南宗的若干宗風可以追溯到本文獻產生的年代,這對於禪宗的研究無疑具有重要意義。我經常考慮這樣一個問題:禪宗到底是把佛教理論提到到一個前所未有的新高度?還是把佛教理論推入了無法發展的死胡同?這個問題我還在思考,沒有能夠得出結論。本文獻對我們追溯禪宗思想的發展歷程提供了新的資料。

在以後的諸輯中,《藏外佛教文獻》將繼續致力於對敦煌禪文獻的整理,也歡迎各界朋友的指導與支持。

“三藏論疏”專欄刊登文獻六篇。

唐道液所撰的《淨名經集解關中疏》的卷上已經在第二輯中刊出，本輯則繼續刊登其下卷。如第二輯《卷首語》所說，該文獻雖曾被錄文發表在《大正藏》第85卷中，但該錄文缺失從第五品後半部分到第七品前半部分，約一萬餘字，且所選底本不是很好，並缺少比較認真的校勘。本輯刊登的卷下正包含了《大正藏》缺失的部分，想必會引起有關人士的興趣。細心的讀者可能會注意到，在本輯發表的卷下中，我們又校改了《維摩詰所說經》大藏傳本的若干錯字。象《維摩詰所說經》這樣重要的經典，且經流傳千年，收入大藏，歷經前代多少人校勘，但它的大藏傳本仍遺憾地留有一些錯字。不僅《維摩詰所說經》，諸如《妙法蓮華經》、《俱舍論》等，都有這樣的問題。這充分說明佛教文獻整理的難度之大；也充分說明今天我們重新整理佛教文獻之必要。

《因緣心論頌》、《因緣心論釋》與《因緣心論釋開決記》三篇文獻恰成一個系列。其中《因緣心論頌》與《因緣心論釋》都是印度佛教著名理論家、中觀學說的創始人龍樹所撰。緣起論本是釋迦牟尼創立的初期佛教的基本理論，它通過對十二有支相互生滅的論述，說明世界萬物都因一定的條件而產生、存在與滅亡，從而論證了有為法的不可恃性與涅槃法的真實性。在釋迦牟尼的理論體系中，緣起論是對世界萬有存在方式的一種詮釋，他並沒有否定世界萬有本身的存在。但龍樹認為，既然萬有都因一定的條件才存在與變化，則說明惟有條件才是最基本的，而萬有本身是派生的，由此導出“緣起性空”這一中觀

學說的基本理論。而《因緣心論頌》與《因緣心論釋》就是龍樹將初期佛教的緣起論改造爲緣起性空說的重要著作，在龍樹的全部著作及中觀理論中都占有特殊的地位。遺憾的是，這兩部如此重要的著作約於八世紀左右在西北譯出後，一直不爲中原人士所知，自然也沒有收入中國傳統的大藏經。本世紀在敦煌遺書中被發現後，人們如獲至寶，隨即將它們編入《大正藏》第32卷。由於當時的條件有限，收入《大正藏》的文本僅依據英國所藏的兩號敦煌遺書錄文校勘，故有若干錯漏。本輯發表的《因緣心論頌》依據七號敦煌遺書校勘錄文，《因緣心論釋》則依據八號敦煌遺書校勘錄文。應該說，新整理本的錄文校勘質量是比較高的。《因緣心論釋開決記》應爲敦煌某僧人所撰，估計是吐蕃統治時期的某位義學高僧，遺憾的是我們現在還沒有資料能考證出他的姓名。該《開決記》對龍樹的頌與釋都有較爲正確的把握，因此對中觀理論作了很好的闡發。把這三篇文獻對照起來閱讀，可以使我們對印度佛教中觀思想有更加深刻的了解。該《開決記》也曾經被錄文收入《大正藏》第85卷，但錄文所依據的英國藏本首存尾殘；且祇有一號，沒有校本。本輯發表的整理本則依據四號敦煌遺書錄文校勘，基本恢復了原文獻的本來面貌。相信這三篇文獻的再次整理發表對研究龍樹及中觀思想的先生們會有若干助益。

《金剛經》是佛教的重要著作，我國古代曾翻譯過六次，其中以鳩摩羅什的譯本最爲流通，所以現在流傳的有關《金剛經》的註疏所註釋的大抵均爲羅什譯本。在敦煌

遺書中，鳩摩羅什的譯本及註疏也占所存《金剛經》及註疏的絕大部分。但本輯發表的《金剛經疏》卻是對元魏菩提流支譯本的註疏，所以彌足珍貴。不僅如此，該文獻對《金剛經》的釋義頗為精當扼要，是關於《金剛經》的優秀註疏之一。該註疏未為歷代經錄所著錄，也未為歷代大藏經所收。幾年前在北京圖書館發現，共三號，經鑒定，該三號體例相同，文字相同，內容前後相屬，本為同一文獻而後撕裂的。而且該寫卷的各紙曾經脫落過，後人綴補時粗心，故現存寫卷的先後順序有錯亂。這次整理已經按照正確的次序恢復原狀。上述三號合綴後，所存註疏的內容，相當於註疏羅什本《金剛經》的第十四分到第三十二分，亦即首部仍有殘缺。但值得高興的是該文獻的首部最近由參與北京圖書館敦煌遺書編目的趙瑞禾先生在英國所藏敦煌遺書中發現。這樣，這個文獻雖然還沒有成為全璧，但總算大體完整了。遺憾的是卷面的有些地方有殘損，以致文意殘斷不全；英國所藏本與北圖所藏本也不能完全綴接。猶如斷臂維納斯，給人以殘缺之美的同時，留給人們一種深深的遺憾。不過，盈虧乃天道之理，萬事大約最終總是要留一點遺憾的。

吐蕃統治時期，敦煌出了一位大德沙門法成。他精通漢藏兩種文字，把不少經典翻譯為漢文或藏文。他又是一個義學高僧，在翻譯之餘，向弟子們開講經論，傳授義理。現在敦煌遺書中保存不少弟子們當年的聽講筆記。本輯發表的《瑜伽論卷第四手記》就是其中之一。這類〈手記〉又名〈隨聽記〉、〈隨聽疏〉，是弟子們聽法成講解

《瑜伽師地論》時所筆錄，敦煌遺書中保存甚多。《大正藏》第85卷整理過其中的很小一部分。對於這些《手記》，若干年前日本上山大峻先生作過較為詳盡的收集、梳理，列出表格，見上山著《敦煌佛教之研究》。此後，又新發現若干新的資料，可以補充。由於法成其人及其思想對於研究敦煌當地佛教及漢藏佛教交流有着重要意義，也均為我國歷代大藏經所不收，所以我們計劃盡可能把有關文獻整理出來。但由於數量實在太多，且這些《手記》均為聽課時的筆記，字迹比較潦草，書寫也不規範，給整理工作帶來很大困難。因此，我們祇能根據《藏外佛教文獻》的篇幅許可及整理工作的進度，把這些文獻逐步貢獻給讀者。

“疑偽經”專欄刊登文獻一篇。

佛教傳統認為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這些相好是僧人禪定時觀想的對象。許多經典中都詳細敘述了這些相好的具體內容。本輯發表的《相好經》是有人把《觀佛三昧海經》中《觀相品》及《本行品》的有關內容摘錄出來，拼綴而成。按照中國佛教的傳統，這類經典，理所應當視作偽經。由於偽經的這種身份，它們大多缺乏必要的整理，因而在流傳中出現種種互有參差的異本。第一輯發表的《天公經》、《佛母經》是如此；本輯發表的《相好經》也是如此，而且情況更為複雜。根據目前掌握的情況，《相好經》可以分為兩大系統，五個異本。一個經典，隨着時代的流馳，出現如此歧雜的異本，在我國古代，除了《新菩薩經》等少數小部疑偽經外，比較少見。當然，有些異本

相互的差異並不是很大，因此，究竟是把它們整理為一本好，還是分別為異本好，還可以再研究。本輯發表《相好經》實際也是為大家研究、探討疑偽經的異本分化提供一些基本資料。

“研究論文”專欄刊登論文一篇。

自三十年代范成和尚於山西趙城廣勝寺發現《金藏》、蔣唯心發表《金藏雕印始末考》以來，《金藏》的聲譽日隆。但由於資料匱乏，對於《金藏》雕印及其後流傳過程，人們始終若明若暗。尤其是所謂《金藏》版片輸京，貯於弘法寺，其後補雕，成為《弘法藏》的假說，經蔣唯心首創，為學術界許多人接受，也成為一樁糾纏不清的迷案。本輯發表的《〈金藏〉新資料考》對新發現的北京圖書館所藏明代遞修《磧砂藏》中關於《金藏》的兩條題記作了認真的考證，相信這一考證對於澄清在《金藏》問題上的各種說法，自會起到積極的作用。

最後，對幾個問題略作說明。

《藏外佛教文獻》第一輯、第二輯所發表的文獻整理本，一般均用五號楷體印刷；但如同一篇文獻中還包括註疏，則正文用五號楷體，註疏用五號書宋體；個別有特殊排版要求的文獻，正文適當放大字號。至於題解、研究論文等則一律用五號書宋體。當時主要考慮盡量利用現有篇幅來擴大該書的容量，以多刊登幾篇文獻。該書出版之後，不少先生表示書中所用字號太小，對於年長者，閱讀尤其不便，希望能夠放大字號。為此，從第三輯開始，本書的文獻正文一般改為小四號楷體；如有註疏，則用小

四號書宋體。至於題解與研究論文,仍然一律採用五號書宋體。放大字號後,本書的容量仍然保持每輯30萬字左右,基本不變。

1996年12月

FOREWORD

Two years and a half have elapsed since we began to prepare for editing the *Buddhist Texts Not Contained in the Tripitaka* in the summer of 1994, and now we have successfully presented the third number to our dear readers.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first number of our book, we have received many letters from our reader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Some have extended fervent support to our work; some have afforded us fresh information concerning Buddhist texts not contained in the Tripitaka; some have put forth emendatory suggestions on our collated texts; and the others have sent us some supporting funds, hoping that we can insist on doing this significant work. I hereby would like to express, on behalf of the whole staff of this editorial board, our heartfelt thanks to our readers who have been concerned with the growth of this series of books; to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Buddhist Culture, the Zhi Lian Jing Yuan from Hong Kong, the General Corporation of Buddhist Cultural Establishments at Shanxi Province, and other related units and individuals that have rendered great support to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series of books.

The following is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third number of the *Buddhist Texts Not Contained in the Tripitaka* :

The column "Chan Texts from Dunhuang" publish two Chan texts from Dunhuang.

The *Pu Sa Zong Chi Fa* was written by a foremost exponent of the Huineng (638 – 713 AD) system in the Southern Chan School, and it has some substantial similarities with the *Guan Xin Lun* ascribed to Bodhidharma (? – 536 AD); theref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texts has yet to be further studied. The text was first discovered

by Mr. Ryosho TANAKA , a Japanese scholar, from the special collection of Dunhuang in France, and he published his copied text and studies. The text here has been recolla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yout of the *Buddhist Texts Not Contained in the Tripitaka* , by both Mr. Daishun UHEYAMA , a noted Japanese Buddhist scholar, and Mr. YUAN Deling, a young research fellow with the Chinese Institute of Dunhuang Studies, with reference to another transcript of the text newly discovered in the Beijing Library. Hence a new collated text to our readers. The Dunhuang studies has already become a worldwide branch of learning, and the collation of the Dunhuang texts as a matter of course needs constant improvement. Consequently, we welcome related scholars of various countries to engage in collating the Buddhist texts among the surviving books from Dunhuang, welcome them to make further efforts to better the collated ones so that we can make a good job of these cultural undertakings of mankind. Those who have been engaged in this work are also welcome to publish their research achievements in this aspect in the *Buddhist Texts Not Contained in the Tripitaka* .

The *Da Cheng Qi Shi Lun* was also written by a foremost exponent of the Huineng system in the Southern Chan School. More seasoned was the ideology of the Southern Chan School reflected in the text, and more incisive the author's style. Now that the text was copied when Dunhuang was under the reign of ancient Tibet, it probably dates from the first half of the 8th century AD. The readers will surely feel this text very familiar who know such Chan texts of later ages as the *Wu Deng Hui Yuan* . This shows that some traits of the Southern Chan School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age when this text was produced and is no doubt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tudies of the Chan School. I of-

tenponder over such a question: Has the Chan School after all raised the Buddhist theory to an unprecedented new height or has it driven the Buddhist theory into an undevelopable dead end? So far I have not come to a conclusion yet. Therefore, this text has furnished fresh material for us to trace back the developmental process of the Chan School ideology.

In the coming numbers of the *Buddhist Texts Not Contained in the Tripitaka*, we shall continue to make efforts to collate the Chan texts from Dunhuang, and friends from various circles are welcome to give us guidance and support.

The column "Commentaries on the Tripitaka" brings forth seven texts.

The first fascicle of the *Jing Ming Jing Ji Jie Guan Zhong Shu*, collected by Daoye in the Tang Dynasty (618 – 907 AD), was published in the second number of this series of books, and we now bring forth the second fascicle of the text. As the "Foreword" to the second number of our book says,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the text has been collected into the 85th volume of the *Dazhengzang*, more than 10 thousand Chinese characters from the latter half of the 5th pin (chapter) to the first half of the 7th pin have been missing, and the selected master copy was not very good and lacked relatively serious collation. As it happens, the second fascicle of the text published in this number contains the part the *Dazhengzang* has lost, and I am assured that it will arouse our readers' interest. Careful readers may notice that, in the second fascicle of the text published in this number, we have corrected a number of wrongly written Chinese characters found in the *Vimalakirtinirdesasutra* contained in the *Dazhengzang*. Such an important scripture as the *Vimalakirtinirdesasutra*, handed down for more